

教壇風雲

我的采编人生

金正扬 著

历史是一部厚重的教科书。打开这部纪实性的采访实录，十一位教育名家的人生故事里，有你追求的梦想；八位教坛名师的教学档案里，有你要取的「真经」；十三位校园领军人物的治校方略中，有你要寻求的办学「秘诀」；还有那记者笔下的「采编故事」和「申城教改纪事」，更会给你以智慧和力量……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教坛风云

我的采编人生

金正扬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坛风云:我的采编人生 / 金正扬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520-0844-9

I. ①教… II. ①金… III. ①教育改革 - 上海市 - 文集 IV. ①G527.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5673 号

教坛风云——我的采编人生

著 者:金正扬

责任编辑:陈如江

封面设计:周清华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铁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42.25

插 页:2

字 数:57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978-7-5520-0844-9/G·403

定价: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献给光荣的人民教师！

三十年教坛风云，多彩多姿，浓缩笔下；

四十载采编人生，勤采勤编，凝聚纸上。







我很平凡，一生中一直在平凡的岗位上干着平凡的事。但我这几十年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几乎都在围绕着“教育”这个轴心不停地转动着，工作着……

—— 作者心语

序

吴立岗

这是资深教育记者金正扬同志用近 40 年心血写就的又一本很有份量也很有价值的著作。她与两年前出版的《岁月留痕》相辅相成,可谓“姐妹篇”。

金正扬同志也是教师出身,曾在上海市向明中学教过书,但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新闻工作。我和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相识了。那时,他在《上海教育》杂志担任教学组组长,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选题,研究文章。当时,市教育局领导也常邀请我们上海师大搞教育科研的同志深入到中小学中去,指导教师搞专题实验研究。因此,作为市教育局的机关刊物——《上海教育》杂志的编辑、记者,同我们联系特别紧密,金正扬同志也经常约请我们写文章。

记得 1981 年初,金正扬同志听说我在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三年级开展作文“课内素描”试验,很有兴趣,觉得这是个好选题,很值得推广。于是,他立刻放下手中其他工作,深入到虹口三中心听课、采访,仅用一周时间就写了一篇长达 5000 多字的通讯,刊登在《上海教育》1981 年第 3 期上。这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人生的旅途上,无论从事什么职业,要想事业有成,一是要有所追求,要有人生的渴望;二是要勤奋,勇于跋涉攀登。对一个记者来说,要创造人生的辉煌,还要具备腿勤、口勤的好作风。亲见亲历,这是确保新闻真实的前提,至关重要。记者只有深入下去了,“沉”到了学校教师中间,才能从教育第一线挖掘到鲜活的生动报道资源。金正扬同志也正是以他对事业的

强烈渴望,以他的一贯勤奋、刻苦和作为一个记者应有的职业敏感,才写就了一篇篇内容深刻,并富有时代气息的文章。

金正扬同志从事教育新闻工作40载。这40年中,他走过无数城市和乡间的学校,访过许多教育大家和教坛名师,写过不少治校有方的校园领军人物;同时,他作为《上海教育》主编,更亲历了上海一期课改和二期课改,撰写了不少反映上海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好文章。这本60万字《教坛风云》和她的“姐妹篇”——《岁月留痕》,既是他40年来教坛运笔的结晶,更是他对上海30多年来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历程的历史见证。

《教坛风云》是一部纪实性采访实录。作者以一个记者的教育视野,从不同的侧面,或专访一位位教育大家,聆听他们对教育的真知灼见,捕捉他们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或以“历史追忆”的方式,回顾过去岁月教育教学改革中发生的值得回味的历史事件;或以“访谈”的形式,倾听一位位校园领军人物畅谈上海二期课改新理念给学校教育教学带来的深刻变化;或直接走进名师课堂,以生动的文笔,形象而又准确地再现名师的教学艺术和风采;或从一个记者的角度,站在上海基础教育的转折点上,直面教坛“风云”,发表评论和见解……这不同的侧面,分散,是一个“点”;汇总,就是一个“面”。这样由“点”到“面”,可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上海基础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教坛风云》虽不是在写“史”,但却是一部活的、立体的,并实实在在地反映上海教坛30多年来变化和发展的极为生动的教育发展史。

《教坛风云》和《岁月留痕》,对广大教师来说,更是一个“名师大课堂”。作者笔下的名师,有从幼教的赵赫,到小学的袁璐、倪谷音、顾家璋、贾志敏,再到中学的于漪、高润华、陈延沛、张景新和朱浦等,前后加起来有20多位。老师们都可从这里取得“真经”。其中,作者对著名特级教师袁璐的深度采访——《走自己的路》,详尽地写了袁璐的成长道路和她语文教学的宝贵经验;还有“聚焦于漪”,作者从三个不同时期,分别有侧重地写了于漪老师对中学语文教学的探索与研究。凡此都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值得我们广大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学习和借鉴。特别是那篇《听贾志敏讲“真语文

课”:阅读与作文教学》,更发人深思。它告诫人们:我们的许多传统做法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教育教学经验,远不是一些人想象得那么落后,而是具有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今后的教育改革要特别慎重,不要把我们过去做法中的许多精华当作改革的对象而予以丢弃。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金正扬那“采编岁月”里“讲不完的故事”,每个故事也都无不蕴含着人生的成功之道。这对我们青年教师来说,细细品读,更可从中获得不少启迪和教益。它告诉人们,一个人不管干什么工作,都应该有所追求。人生不能没有梦,有梦才会有追求。只要认定一个目标,长期坚持不懈,就会事业有成,就会梦想成真。

《教坛风云》洋洋 60 万字,是作者近 40 年教育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心血与智慧的结晶,也是作者人生的最大一笔精神财富。读者透过这一篇篇无声文字的字里行间,我相信一定会从名家名师的教诲和实践经验中获得更多的启迪。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研究员,全国中小学写作教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顾问)

自序

人生苦短,生命有限。

完成这本 60 万字的《教坛风云》,回首走过的路,不觉已匆匆度过了 72 个春秋。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上世纪 60 年代年轻人常引用的一段名言: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至于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至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这是苏联作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说的。它曾鼓舞和激励了不少年轻人。

志当存高远。在那个“火红”的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有谁不在为理想而生活。不少人都非常纯真地把这段名言抄录在日记本的扉页,作为自己人生的“标杆”。正是怀揣着这样的信念,我初中二年级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但我很平凡,一生中一直在平凡的岗位上干着平凡的事,没有干过什么所谓轰轰烈烈的“大事”。这几十年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几乎都在围绕着“教育”这个轴心在转动着。这正如我在《岁月留痕》一书中所言: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除了读书、休息,几乎都在为他人做“嫁衣

裳”，都在为基础教育鼓与呼。

我很欣赏我国现代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邹韬奋先生在《“生活”周刊究竟是谁？》一文中所说的话：

一个人光溜溜的到这个世界来，最后光溜溜的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彻底想起来，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尽一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

这话讲得很实在，很得体，令人可信。其实，我这三四十年来所做的平凡事，也正如韬奋先生所说，“尽”了我“一人的心力”，干了“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的事。

我觉得，我一生能这样，足矣！因为我干得事，虽不“起眼”，但那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

我出身贫寒。我的童年时代，是在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度过的。降生的时候，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最残酷的相持阶段，敌我双方的斗争异常惨烈。我的出生地——江苏省阜宁县獐沟乡，就地处历史上有名的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东北角。新四军与敌伪军在这里一直处于“拉锯战”状态。敌之“清乡”、“扫荡”是常有的事。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残酷的“扫荡”和反“扫荡”的斗争中一天天过来的。

儿时的家境，我已记不太清楚了。长大后，听妈妈说，我出生后不久，父亲就把我过继给二妈（我的二伯母）了。因为我的二伯父 20 来岁就溺水身亡，二妈就此孤身一人，身边无一子女。我父亲不忍心，念在他去世二哥的情分上，就把我过继给她。为了生活，爸爸、妈妈就先后离乡背井，到上海投奔哥哥嫂嫂了。从此，我就和二妈相依为命。生活，靠着父亲留下来的几亩薄田，由舅舅家的人代为耕种，收割时给我们“几粒粟”，聊以糊口。

我在我所写的《岁月留痕》一书的“童年的苦难和欢乐”一节中有这样

两小段描述：

在那艰苦的岁月，我的童年是不堪回首的。那时，不消说“一日三餐”，就是“一日两餐”，在今天看来，也令人难以置信。那锅里煮的，全是胡萝卜、山芋和青菜之类的东西，还是稀稀的，看不到什么米粒。一年中，只有在过年的那几天，家庭境况稍好的人家，才能吃上几顿干饭。

二妈对我十分疼爱。平时，她怕我饿着，影响发育，常常把家中那仅有的一点点米，设法用纱布袋包着放在锅里煮，然后捞起来，单独给我吃。自己吃剩下的那看不到米粒的所谓“稀饭”。我每每想到这些，就禁不住潸然泪下。

当然，在那个岁月里，还有比我们更苦、更穷的人家。我记得，有的人家子女多，或家中有人卧病不起，那往往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要是在冬天，一家七八口人，大多数盖着一条仅有的破棉絮，蜷缩在一张床上。白天，几个人合穿一条破棉裤，轮流外出干事。这在现在，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不过在那时，生活就是这样的残酷。

我二妈，虽没有文化，却是一位很有修养的女性，裹着一双小脚。她很喜欢听人说书，人也很慈善。她尽管自己家中也仅有那么一点难以糊口的粮食，但只要看到左邻右舍有“揭不开锅”的时候，她还是要从口里省下一点，送上一瓢两勺。二妈的这一举动，从小就在我的心田里播下了人间最“善良”的种子。我离开家乡近60年了，但我永远忘不了儿时的那艰难岁月，更忘不了二妈为我付出的一切。

我的学童时代，就是在这样的贫穷的乡下度过的。小学也是在离家很近的村小读的。

但我也很幸运，在我读完“初小”，升入离家不远的王舍完全小学时，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他叫王庆余，多才多艺。王老师教我们班语文，并

担任班主任。他的文学功底也很深,写得一手好字,而且口才很好,讲起课来声情并茂。

那时,在这贫穷落后的乡间小学,校园就如同一片“沙漠”。课外,没有一本图书可惜。因此,我们最喜欢听王老师讲《高玉宝》中的故事。这是一位部队作家的自传体小说。他利用每周一节的语文兴趣课,不紧不慢,有声有色地给我们讲故事。要我们只带上“耳朵”,不要“开小差”。我们坐在台下,静静地听,不用纸不用笔,一个个听得像着了迷似的。我爱好文学的种子,就是在那时悄悄孕育的。

在生命的长河里,人生处处有“拐点”。1956年6月,在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父亲来信要我到上海来报考中学。我二妈为了不耽误我的前途,二话没说,含着泪鼓励我到上海求学,那年我15虚岁。

我来上海后,父亲考虑到二妈一人在乡下连个伴都没有,又把我唯一的妹妹过继给她。

初中,我是在上海市长阳中学读的,离我们家不远。这虽是一所刚创办两三年的新校,但在这里也有不少资深的好老师。教我们语文的陆公权老师,就是令我敬慕的一位。在他一次次的激励下,我儿时爱好语文的梦幻的种子,就此开始萌发。我在《岁月留痕》一书中有这样几小节描述:

记得初一下学期,开学不久,陆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暑假中的一日。

我写的是到上海浦东高桥海滨浴场去游泳——这是我们班在暑假中组织的一次集体活动。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大海边,第一次亲吻大海。这篇文章,我写得很生动,当中还穿插了一段对故乡的回忆,我至今还一直保存着它,总舍不得丢弃。

陆老师看了,喜不胜收,在我的作文簿上,批上了个大大的“5”分。他不仅在我们班里边朗读边讲评,而且还拿到他教的初一(8)班去朗

读、去讲评。这还不算,还把我的这篇作文,推荐给同年级组的其他语文老师。你说,这对我的心灵有多大的震撼呵!

小学和初中的这两位语文老师,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值得敬仰的老师,也是我人生的引路人。

但人生没有坦途,要不断跨过一个又一个人生之“坎”。

就在我初中三年快结束学业,企盼将来有一天能成为一名走南闯北的记者,成为一名为人民而讴歌、为人民而呐喊的作家时,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摆到我和父亲面前:是考高中,还是考中专或技校?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我们家经济很困难,父亲活得很累。一家八口人全靠他那仅有的 83.5 元的工资,几个弟弟都在读书,还要给在乡下的妹妹寄点钱。所以,父亲竭力主张我考中专或技校,早点工作,挣钱养家。

我也理解父亲的难处。但转而一想,如果不读高中,我多年的梦想,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班主任阮史华老师也认为,我不读高中太可惜了,因为我是她班上成绩最优秀的一个。于是,她主动跑到我们家,同我父亲谈了近两个小时。我父亲终于被说动了,同意让我报考高中。就这样,在我人生的最关键的时候,阮老师帮助了我,我也没辜负老师和父亲的期望,一举考进了市重点中学——上海市市东中学,还获得了每月 7 元的人民助学金。

我的一生完全是在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读完高中,虽没有考进我心仪的大学新闻专业,但并没有偏离我的爱好,进了培育“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摇篮——上海师范学院,读的是中文专业。我父母比我还高兴,因为读师范,非但不用交学费,国家还免费供应伙食。这样一来,可减轻家中不少负担,二弟也有希望进大学读书了。

一个人的成长和事业的发展,父母的关爱,父母的奉献,是最为无私、最为重要的。我从穷乡僻壤的农村到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是父亲的一封来信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才使我那童年孕育的梦幻种子方有萌发的可能。这一直是我难以忘怀的。

我父亲没有进过正规的学堂,小时候只读过几年私塾。但他很酷爱读书,爱好古文和书法,写得一手好笔。我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上班的上海百达棉织厂离家很远,但他一下班仍要挤出时间骑着自行车去读夜校。这无形中也在影响着几个正在家中求学的我们。

父亲对我和几个弟弟的学习,平时虽无暇顾及,但他一直在激励着我们。记得我读初中时,每获得一张奖状,他哪怕手头再紧,也会毫不吝惜地买上一个镜框,把它挂在那小小“客厅”兼奶奶卧房的墙上。初中三年下来,那墙上不觉竟出现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每当亲戚朋友来作客时,他脸上总是因此而堆满微笑。

我母亲没有什么文化,只认识自己的名字,但她为我和弟妹5人付出的代价最大。她脾气虽很急躁,但心底很好,奶奶说她是“刀子嘴,豆腐心”。每天,她要为我们一家人洗衣做饭,常常是忙到半夜,我们一觉醒来,她还在不停地洗,不停地在擦。而她自己吃的,大多是我们几个吃过的剩饭剩菜。

母亲一向很节俭,一分钱要掰成两半用。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母亲更是费尽心思,为了我们的健康成长,她总变着法子买一些既省钱又有营养的东西。每天早晨,我们还未起床,她就一早去排队,买那当时最便宜的豆浆和油条,说“这最有油水、最有营养了”。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她为了把家料理得更好些,多一点时间做家务,每天上下班,总是连奔带跑。我每每看到她那远去的背影,或迎面而来的急匆匆的神态,我的心就不由得一阵抽紧,恨不得自己能早点长大,早点事业有成,为父母分忧。

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是与社会息息相关的。社会的变革,常常要打破人们的美梦。

1963年秋,我考进上海师院后,平静而又充满活力的大学生活仅持续了两年半左右,我们便被卷入了政治运动——先是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四清”运动),接着便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原本宁静的校园,很快“闹”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不久,两派又发生了武斗,教学大楼成了双方争夺的“战场”。这一直持续到1968年两派实

行“革命大联合”。

在那段日子里,我很迷茫,很不解:为什么原来好端端的同学,竟然一下子变成了敌对的“双方”?我找不到答案。

于是,我渐渐开始远离这一“漩涡”,在逍遥中同大班中的一位学友办起了一份油印小报,取名为《望长城》。办了几期后,又一起参与办铅印的《井冈山》报。后来,还到工厂去体验生活。也许,这既是我对人生之梦的一种追求,也是在迷茫中的一种思想寄托。不过,令我未曾想到的是,在两派实现“大联合”后,我却由此而被推荐到《上海师院报》当了一名校报记者,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采访工作,圆了一次做记者的梦。

但可惜的是,这段准记者的时间不长。1968年8月,我们六七届大学生开始毕业分配。我报名来到了江苏泰州红旗军垦农场,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过起来了军营生活。

说来也巧,我这个人总是与“文字”有缘。到了军垦农场后,我又荣幸地成了连队的一名“文书”,再一次和“文字”打起了交道。“文书”的这个岗位,使我对人生之梦的追求又多了一个机会。我和连队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陈耘、沈原梓等,常和团部的新闻干事在一起谈论写作的事。我也不时地写点小文章投“石”问路,借此试一试自己手中的笔到底怎么样。

这准军营的生活,我在泰州红旗军垦农场过了两年。这两年,对我一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是终身受益的,养成了我在艰苦环境下坚持生存的勇气。解放军的连队指导员斩钉截铁地说:“你们在这里摸、爬、滚、打两年,将来到社会上,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能经受得起考验。”

1970年,随着全国“复课闹革命”的深入,一个急迫的问题摆到了学校的面前,那就是师资的匮乏。于是,上面一声“调令”,我们又回到了黄浦江畔。我被分配到上海市向明中学,走上了期盼已久的教育岗位。

不过,在向明中学,我仅教了4年书,给七三届学生上语文,并担任班主任。1974年2月底,我刚送走他们,又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被借调到市教育局,从此开始了我40年的记者生涯。

这40年,岁月留下了我串串前行的脚印,有深有浅,这是我人生的印记。

如果说,我一生在从事教育报刊事业中还有那么一点小小成绩和贡献的话,这除了生我养我父母的教导,小学、中学和大学老师的培养,以及单位领导、同事、朋友和亲人们的关心、帮助外,还得益于一直和我同甘共苦、悉心照顾并在事业上予以支持的我的夫人——毕业于上海幼儿师范学校的徐银娣。

她同我一样,出身于贫困的家庭,但她对生活的那种坚韧程度是我所不及的。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在上海郊区——宝山县庙行小学教书,从开始教低年级语文,到后来兼管全乡的幼教工作,生活再苦,她总能默默坚持着,忍受着,把苦水咽在肚子里。她也很会体贴人,关心人,读书时,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大姐”。

我和她结婚的最初岁月,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那时,我正在向明中学教书,我乡下的二妈不幸患癌症去世。我因刚工作不久,为未能报答其养育之恩而深感内疚和自责。我们在结婚时都一无所有,在向同学借了600元钱才完成了人生中的这件大事。婚后,双方还都要贴补家用。剩下的仅有的那么点钱,要吃,要穿,要还债,还有各种各样的开销,生活十分不易。在精神和经济的双重煎熬下,我瘦得100斤还不到,连学校让我义务献血的资格都没有。这时,是我的夫人毫无怨言、一声不响地陪伴我渡过难关。有时,家庭中发生一些矛盾,她非但不责怪,不埋怨,反过来还会来劝慰我,要我把心放得宽一些,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面包是会有有的”。她用自己的爱与付出,撑起一个家庭的半边天。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我也越来越忙,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采编业务上。妻子为了减轻我的负担,尽量忙里偷闲,帮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有几年,我为汉语大辞典出版社主编《小学生规范词典》,工作量很大,她帮我查资料,注音,抄写条目,不声不响地做了许多不留名的工作。在我前行的脚印上,同样也洒下她辛勤的汗水。她与我执手漫